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研究丛刊  
主编 叶嘉莹 副主编 孙克强

# 词文献研究

任德魁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主编 叶嘉莹 副主编 孙克强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研究丛刊之二

## 词文献研究

任德魁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文献研究 / 任德魁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310-03386-7

I. ①词… II. ①任…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541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 插页 264 千字

定价: 4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 序

李剑国

当玩弄“思想游戏”的空疏不根之学成为“一年磨十剑”的速成门径之时，不用夸大，学术也就算是完了。好在学界趋于清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献实在是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其价值和意义，无论作多高的估计都不为过。中国有着非常优秀的国学传统，其中考据校讎之学是其精华。清学重考据，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之外，殆不必置论”（《清代学术概论》+《考证学的“群众化”和惠栋学派》）。这个学术思潮造就了一大批大师，又深刻影响到清后数十年间的许多大师。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华而不实的治学风气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提倡“回归传统”就显出必要。所谓回归，也就是梁启超说的“以复古为解放”（同上书二《略论“清代思潮”》），继承和发扬前贤“科学的研究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自然，学术研究是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运作，不必人人效仿清儒专攻考据和校讎，理论阐释同样是研究之重。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模式都离不开梁启超所归纳概括的清儒的“科学的研究精神”。我的理解，这就是求真务实，就是一切论证和观点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和文献的基础上。舍此莫办，否则只能是“假大空”——虚假错误的谬论，大而无当的穷侃，空中楼

阁的缥缈。

清儒创立的校讎学，即广义的校讎学，而不是狭义的校勘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文献学。习惯上包括历史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学，其实二者又是难兄难弟，常常无法分开。一般理解，文献学是研究古籍的分类、编目、版本、编纂、传播、典藏、校勘、辑佚、辨伪、标点、注释、翻译等方面的理论和运用的综合性学科。除了对文献学自身的研究之外，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主要是运用，即运用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古籍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版本、体例、校勘、辑佚、辨伪这几项。古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多形成不同的版本，并且多有散佚和舛误，这就需要作版本研究和校勘、辑佚、辨伪。因此文献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复原和存真。文献对于古代历史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一任务上，拿文学研究来说，对某个时代或某个作家，倘若作品文本不齐备、不准确，研究的结果可想而知是什么模样。

我讲这些常识性的话——虽然对学风被严重扭曲的不少人来说并非常识，是为了引出我要介绍的一部著作，就是我的学生任德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专著。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就词作方面，编纂出版了《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等断代总集以及许多词作的校点本。但是存在问题还是不少的，文献理念和方法上的偏差，版本和体例的不明，知识上的欠缺，造成许多失误。而这种种失误仍在不断发生。德魁根据多年的积累和研究，从词作辨伪、词作辑佚、词集版本研究和词集校勘以及词律研究等五个方面，从理论和方法上总结了词文献整理研究的成败得失。失误作为“误例”被纳入全书的论述中，一一被揭示出来，不用说，这是对整理出版的词作总集、别集的非常有价值的校正。

辨伪历史久远，而辨伪之为学乃是明清时期奠定的。虽然

关于“伪书”的定义和范围以及辨伪原则和方法还不尽科学、完善,而且常常将伪书和古籍中的伪事混为一谈,但辨伪无论在理论和方法的建构上还是在具体古籍的辨伪上,成就都是巨大的。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将伪书种类和生成原因归纳出二十余种,同时归纳出八种辨伪方法。清代崔述《考信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等都是清世辨伪名著。近世梁启超对辨伪学作了全面总结,他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第四节《辨伪书》)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总论》第二章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伪书种类归纳为十类,并归纳辨伪方法,或为十三种(《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一《总论》第四章),或为六种,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则概括为“辨伪十二公例”。此后张心澂著《伪书通考》,成为辨伪学的集大成之作。

德魁在书中将词作辨伪列为首章,表明他对辨伪的高度重视。辨伪学中古籍之“伪”,情况非常复杂,而所谓“伪词”主要表现为词作和所署作者之间的悖误,大体就是梁启超说的“书不伪而撰人姓名伪者”和“原书本无作者姓名年代,而后人妄推定为某时某人作品”。其实无论是词作还是作者大抵都是真实的,只是此人无此词,或者说此词作者非此人,故言其“伪”。这是词作辨伪的特殊性(诗、文大体亦然)。针对“伪词”的这种特殊性,德魁将“伪词”产生原因分为假托与误入两种,而误入按其属入的方式又可分为误读和淆乱两种。他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伪词产生

的四个原因：对于古籍内容的误读，对于古籍体例的误读，混淆文体，传抄疏忽。而在“伪词”辨伪方法上，在前贤辨伪理论基础之上，特别论述了“利用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综合考证”的基本方法。在论述词作辨伪的过程中，德魁举出大量“伪词”词例，如所谓朱淑真《生查子》、《酹江月》，秦观《兰陵王》、《满江红》及《如梦令》等六首，刘潜《六州歌头》，李煜《后庭花破子》，左誉《眼儿媚》等五首，滕甫《蝶恋花》二首，元好问八十余阙寿词，等等。少数前人已有考辨，德魁作了更有深度的解说，而多数乃为德魁所发明。这些“伪词”考辨，观察细微，思维缜密，文献熟稔而游刃裕如，显示出深厚的考证功力。

如果说辨伪是剥离，是“验明正身”，是“清理门户”的话，那么辑佚是发掘，是补遗，是“存亡继绝”，是发现整理失传散佚的古书和现存古书的遗文。辑佚假如从宋代算起的话（有尤袤说、陈景元说、高似孙说、王应麟说等），到清代蔚成大观。但是清人辑佚普遍缺乏辨析，故而梁启超挖苦清人辑佚者是“抄书匠”。他提出辑佚“既须求备，又须求真”的原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第五节《辑佚书》）。实际上，求备既难，求真尤大不易。说实在的，即使当代学者，在辑佚上也常常出问题，毛病主要就在“求真”上。辑佚的根本目的是复原（近似的复原、部分的复原），倘若失真，何以言“原”！辑佚基本方法是根据古文献的引用。但文献引书常有错误，须从各种角度进行考辨，倘或一见注为某某书就从而辑之，欲求其真则难矣。而古书征引又常常不注出处或出处脱去，若对此一概不顾，则必有所失，欲求其备亦难矣。

德魁在《词作辑佚》一章，对词作辑佚的方法、标准、辑佚致误的形态等重要问题作了很有深度的讨论，这里体现着他清晰的辑佚理念和丰富经验。比如他提出了五种词作辑佚方法，其

中第三种是“注意细节,发现问题,分析规律,综合考证”。他说:“辑佚总是与辨伪、考证相紧密联系的。辑佚不能遇词便辑,必须经过考证,论定是非,明其归属。”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他提出词作辑佚的基本标准,就是“力求最大程度上恢复原貌”。以上论述,都结合以许多误例,这些误例都是他发现的。他还专节批评《全明词》的疏失,一共举出十一项之多,如误收、漏辑、书名人名错误等等。德魁自己也作过词作辑佚,补辑宋无名氏词《喜迁莺》等九首。切莫认为数量不多,须知在“经过唐圭璋、王仲闻、孔凡礼等先生的不懈努力,《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全金元词》已基本上将存世典籍中的佚词搜罗殆尽。各类传世典籍已大部分经过检核,尚未发现的佚词稀如星凤,辑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补辑了这九首谈何容易!

对于词集版本研究,德魁亦多有心得。他概述了宋、明、清三朝词集版本研究的概况和成就,并就具体版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方法与规范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提出五条方法,就是检序跋,查著录;审体例,研编次;从细节入手,辨别版本;根据典型特征,确定版本传承关系;利用前人记载辅助判断。他还对《唐宋名贤百家词》的编者、书名、版本和元遗山词集版本源流作了个案研究,此间贯彻了他提出的规范和方法。尤其是后者,是他多年研究元好问词集的总结。这个问题他早就有过研究,发表过论文,书中又作了补充。他于《遗山乐府》版本校勘从事多年,研精覃思,立志重新整理,已经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

文献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校勘。前人论校勘有所谓死校、活校之说。死校是简单地注记异文,而本校、他校、理校等则属活校。死校或曰对校只明异同,不定是非,是所谓“不校之校”。这种方法在保存版本上有用处,但校勘古籍的要义就是纠错补遗,恢复原貌,因此校勘主要还是活校。活校尤其是理校其

实就是考据,而往往一字之校就需要运用多方面知识和文献,难度可想而知。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粗率行事,难免会发生以误易误甚至是不误而误校的严重情况。前人讲“书籍之讹实由于校”,说的正是这种滥校胡校。在本书中,上述各部分多已涉及到校勘问题。德魁在《词集校勘》一章中,则专门对词集校勘的方法和原则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结合大量例证作了阐释和发挥。例如对于理校,他总结出利用典故发现讹字,利用形近发现讹字,利用字形分合发现讹字的方法。他还颇有见地地特别提出“体例校勘法”,提出利用词的特殊性如词律、和韵等进行校勘。凡此都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意见。他还用大量篇幅,列举和分析《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全金元词》等词总集在校勘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众多错误,皆有理有据,对于厘正文本大有裨益。

本书最后部分是对词律的研究。词律属于词学范畴,本身是个独立系统。词律对于词作的文献学意义,主要体现在校勘等方面,德魁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对词律予以关注的。词律是词作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校勘必须明词律。而词律本身又相当复杂,缺乏深入细致的把握,不了解或忽略某些环节和因素,必然影响判断的正确。德魁从词律的词调、句式、押韵三方面作了探讨,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他还就词律研究发表了有益的看法,其中谈到充分利用校勘成果这一点。词律研究和词作校勘实际是一个互为表里的互动关系,这是德魁对自己研究经验的深刻概括。

纵览书稿,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突出,也非常重要,就是体例问题。德魁在书中说:“本书在学术研究方面,试图强调体例研究的重要性。在涉及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和词律研究等各个方面时,只有把握好古籍体例,才不会横诬古人,贻误来者。”通

过体例来考辨问题,在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古人讲读书须明版本,窃以为还须明体例。体例问题实文献研究之大者,可惜以往文献学著述常予忽略或未予强调。古籍的“凡例”之类是说明编纂体例的,但大多数古籍并无体例说明,而且体例除编纂体例还有行文体例等。因此,体例不像版本是摆在那里的,多数情况是隐藏在书的内容和款式中,非浸淫于其间难以发现。而恰是这些隐伏的体例信息,成为校勘和考证的重要根据。我研究古小说,常常注意到体例问题,以此来解决问题。这里不妨举两部书作为例证,作一点简要解说。《太平广记》作为小说渊薮是极为重要的辑佚校勘文献,其体例我们自然可以从门类设置编排、出处注记、引文标目等方面去考察,但它还有一些不易发现的深层体例信息,对小说辑校和考据非常重要。其中一点是改人称,凡原作以“予”、“余”、“吾”行文者绝大多数改为作者姓名。明乎这一体例,许多难题和疑问便迎刃而解,不仅可以解决作者问题,还可解决恢复原文的校勘问题。例如《古镜记》的作者是王度,《崔少玄传》作者是王建,《东阳夜怪录》作者是王洙,等等。有的学者不明这一体例,以致于误判作者,如以《古镜记》为中唐人作,以《玉堂闲话》为王仁裕门人所编等。另外,《李娃传》开头那段疑文“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也不难解释,这段话并不是后人所加,而属于本文,不过被《太平广记》编纂者改动了。“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原文必是“故余为撰述”,而传文原署必是“监察御史太原白行简”。由此又可进而解决《李娃传》创作年代问题。《太平广记》的另一个体例便是常常在开头纪年或人名前加朝代名,如“唐李林甫”、“唐开元中”等,触目皆是。我们看出版的有关小说集,点校者在辑录时都予以保留,殊不知古人行文断不如此,这个“唐”字必须删掉。我要举为例证的另一部古书是东汉

应劭《风俗通义》。在《正失篇·封泰山禅梁父》中有“《封禅书》说：‘黄帝升封泰山……’”云云一段，有人断为《封禅书说》，并称《封禅书说》就是《汉书·艺文志》十五家小说中的《封禅方说》，自以为发现了只字无传的《封禅方说》的一条佚文，兴奋之状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其实只要仔细翻翻《正失篇》其余各节，就会发现应劭行文用语自有规矩，他先引“俗说”、“《汉书》说”等旧说，然后再以“谨按”领起议论，引经据典进行驳斥。“《封禅书》说”正属此例，乃《史记》之《封禅书》，与《封禅方说》纯属风马牛！可见，明体例实乃治学津要，万万马虎不得。德魁研究词文献高度重视体例问题，对许多词文献的体例体察入微，并加以运用，实在是真知灼见。

文献研究本质是“知识考古”，它需要研究者做到原始资料占有的最大化和资料处理运用的最优化，需要视野的开阔和思维的周密，需要像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小说那样严谨的推理，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需要恪守学术规范，也需耐心、细心、潜心，需要坐得住冷板凳。德魁作为一位年轻学人，有强烈的文献意识，对词文献和其他古代文史文献相当熟悉，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文献学方法。本书充分显示出他的深厚功底，是对词文献治理研究的很大贡献。这不是我作为导师的偏爱，对他的博士论文，无论是校外评审专家还是参加答辩的学者都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一位专家这样说：“其成果之丰硕，令人可贺可喜；其用功之劬勤，令人可敬可叹。”

德魁博士是山西孝义人，大学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太原师专中文系任教。后考入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刘畅教授攻读硕士，2002年毕业后随我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05年毕业后入博士后流动站，在叶嘉莹教授的中华

古典文化研究所研究词学和词文献。所里要陆续出版系列丛书,德魁的《词文献研究》入选其中。他嘱我写序,我自然欣然命笔,对他的著作发表了些许看法,草草如上。我们师生友情甚笃,曾合写过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我主编的《唐宋传奇品读辞典》,他撰稿五万多字。虽然他不研究小说,但校勘注释自见专长,对传奇作品的分析也很到家。他还负责为辞典搜集图片,这得济于他的电脑特长。他确实是电脑专家,精通电脑软件,而且搜罗了许多电子古籍,足以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电子图书馆,文学院的许多教师学生都曾受惠于他,自然我受惠尤多。德魁今年三十五岁,“三十而立”,可谓有成。伊川先生云:“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德魁勉哉!

2007年5月21日

## 引言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各自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在以往词学大师们所建立的研究格局之上,不少学者对词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发掘和界定,对其未来作出了展望,力求更新研究理念、丰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空间。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龙榆生先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指出词学研究包括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五个传统领域,同时展望未来,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开拓的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刘扬忠先生《宋词研究之路》将前贤总结和构想的词学研究门类归纳为十二项,并结合时代与学术发展,提出了更为系统化的“宋词研究体系”。进入 21 世纪,王兆鹏先生《词学史科学》为该体系补充“词的传播和接受”这一新兴领域,为简明起见,将词学研究的范围分为词体、词人、词集、词论、词史和词学史六个方面。尽管词学研究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但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有待开拓的领域不断出现,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

每个学科都有其最基础的文献材料,词学基础文献包括词作与词论两部分内容。由于“诗学”定义的影响,“词学文献”往

往容易被理解为词论文献。而词学文献研究最发达而且成熟的部分则是运用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解决词作文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词作文献研究尤其是词作校勘,必须充分重视词体特质——词律,这也是词体研究有别于其他文体之处。综观古典文学文献研究领域,赋体文献、诗体文献等以文体相区别的概念已有较多应用。本书拟将词作文献简称为词文献,以文体为限定,既有别于词论文献,也突出了词体特质,使讨论的对象更为单一纯粹,更为准确地反映本书的论述对象。

近数十年来,词学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词作文献方面,编纂出版了《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等断代总集,也出版了《李清照集校注》、《清真集》、《东山词》、《山谷词》、《阳春白雪》等词别集、总集的校点本、校注本。在词论整理方面,出版了《词话丛编》、《词籍序跋萃编》、《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等资料汇编。但断代总集与资料汇编的纂辑完成并不意味着词学文献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相反倒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可以使我们在翔实、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对很多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王兆鹏先生《词学史科学》正是这样一部高屋建瓴、翔实可法的词学文献研究力作。

上文言及,词学文献包括词作与词论两部分。词论作者以清人为主,所涉及的文献问题与词作不尽相同,暂不作专门探讨。本书重点探讨与两宋金元词作相关的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以及词律研究等问题。并试图在对词作文献研究的简单概述中,结合考证实例展开对于研究方法的探讨。进行文献研究,需要从最基本的史料中发掘有价值的内容。关于史料研究,我们知道,大多数史料并非全新出现,关键在于其学术价值的全新发现。王国维在本世纪初曾说过,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因新材料而产生新学问、发现新学科固然很重要,但出现前所未闻的

材料的机遇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在学科范围内重新认识既有材料的学术价值也相当重要。史料价值的重新发现未尝不可认为是广义上的新发现。这种新发现往往取决于看待材料的不同视角和理解材料的深度与广度,有赖于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史料进行研究,发现史料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其他史料之间的联系,从新的角度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可以说,在已有材料中发现问题更是学术研究的内在驱力。

具体事例和范例是两个逻辑统一的概念。我们正可借此对学术研究作出理论上的阐释。亦即,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尤其实证性质的研究,更需要对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概括,从而凭借一些有限普适性的公例,通过演绎推理,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阐释。这是一种互动式过程。学术研究正是一步一步在公例与个案的互动中,由偏离走向中正、从讹误走向真理的。纠谬正误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努力,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前人成果的反动,事实上是对前人研究探索精神的继承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面不易理解的道理,从反面着手则可能会有新警之效。有时候,正面叙述力量不够充分,而举出误例、究其致误之由,则可能是一个简单易喻、事半功倍的途径。因此,本书在每章内均以误例作为专节探讨。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文中所指出的前人错误很可能是不误而误,甚至以误易误,因此诚挚地期待方家硕学指谬正误。

词文献研究本身虽然是一门实证的学科,但进行一定的学理性研究还是必要的。如果说对于词文献研究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尚须长期积累、时机不够成熟的话,那么诸如毛晋词集校勘体系与得失这一类基础课题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及时进行。此外还有大量潜存于基础文献之内的后续研究课题,由于版本源流考察、文本校勘等基础文献研究不够深入,尚未发掘出

来。例如本书将详细考证元好问词集《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本的流传脉络,并指出其第五卷所收八十餘阙寿词都是伪作。这些被篡入名人词集的寿词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就很值得研味。与朱淑真《断肠词》的辑集过程一样,元好问词集的版本研究与作品辨伪也涉及了校勘学、版本学上善本与足本的问题。又如《永乐大典》残本存有为数不少的宋词,除了部分佚词已被辑出外,其他部分大可用于校勘。而据以辑出的佚词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源于《大典》的作品归属错误很多,而致误原因与《大典》纂辑时的观念、方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更可由此及于诗、文等其他文学体裁,因而进行《永乐大典》辑佚词研究也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

在涉及版本、校勘、辑佚、辨伪、词律等词文献研究的各个方面时,只有把握好古籍体例,才不会横诬古人,贻误来者。因而本书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力求强调体例研究的重要性。本书同时补充了大量实证性内容,有的考证内容与方法论述有相当关系,但专题考证篇幅过长,如果不论证完整、首尾具足则不足以说明问题,欲考证完全则自成一体,置于行文之中很容易隔断文脉。故此将之附于各章之末,庶几可以起到补充说明、实例佐证之效,而避免割裂之病。

本书按照文学研究的学科架构,突出词文献自身特质,分为辨伪、辑佚、版本、校勘、词律五部分来论述。事实上,全书各部分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没有绝对独立的分科。辑佚必然涉及作品辨伪与版本研究、文本校勘、词律考析等工作,进行词作辨伪也离不开版本学、校勘学各方面的支持。而词律研究又以版本学和校勘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这几部分的划分,主要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并非强分轩輊,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此外,就本书的文献注释体例略作说明。

一、为减省篇幅,凡是征引自《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等总集的词作,一般不出脚注,仅将书名及页码标注于首句之后。《全宋词》有1965年版繁体竖排本、1999年版简体横排本,二书并行不悖,分别以繁、简标注。例如“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全宋词简363/繁282)词”表示苏轼《念奴娇》词,首句为“大江东去”,分别见于1999年版《全宋词》第363页、1965年版《全宋词》第282页。又如“辛弃疾《水调歌头》(簪履竞晴昼,全宋词简5028/补辑51)词”表示辛弃疾《水调歌头》词,首句为“簪履竞晴昼”,分别见于1999年版《全宋词》第5028页、1981年版《全宋词补辑》第51页。下表为常用词总集简称及其版本信息:

| 简 称   | 书 名     | 版本信息             |
|-------|---------|------------------|
| 全唐五代词 | 《全唐五代词》 | 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 |
| 全宋词繁  | 《全宋词》   | 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  |
| 全宋词简  | 《全宋词》   | 中华书局,1999年1月新1版  |
| 全宋词补辑 | 《全宋词补辑》 | 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
| 全金元词  | 《全金元词》  | 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
| 全明词   | 《全明词》   | 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  |

二、为减省篇幅,除非词题、词序与论述内容有关,引用词作一般不注出词题或小序。如有必要注出,较短的词题附注于调名之后,以间隔号区别;较长的词序则专文引述。例如“姜夔《卜算子·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江左咏梅人,全宋词简2813/繁2185)词”,间隔号之后的“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即为词题。

三、对于一些卷帙较多、需要详注出处的线装古籍和没有加标页码的影印本以卷、叶的方式进行标注。例如“钱若水等撰《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十八,《四部丛刊三编》第7册,该卷第7叶”指《四部丛刊三编》第7册《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十八的第7叶,叶号见于该书版心下方。